

长征途中,为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,张闻天提出把自己总书记的位子让给张国焘,毛泽东断然否定了这个建议。

1935,张闻天想让出总书记以挽留张国焘

张国焘对北上决议阳奉阴违

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召开后,2月5日,周恩来找博古说: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,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。我考虑了很久,这个人是毛泽东。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,也是过渡的。博古立即交出相关印章,同时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,争取共产国际批准。

6月16日,红一、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,张国焘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,四方面军不同意,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。博古是非分明,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。6月26日,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的大殿里召开扩大会议。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报告,认为两大主力会合后应继续北进夺取甘南。接着,张国焘发言,主张以西康为后方,南下成都,在川康立足,如果不行再北进不迟。在彭德怀、林彪发言表示支持北上后,博古讲了话,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、周恩来的北进计划。张国焘在会议上陷于孤立,不得不暂时接受中央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。

6月28日,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在一、四两方面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,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。而张国焘对两河口的决议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,回到杂谷脑后,他立即召开会议,散布不满情绪,挑拨一、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。

毛泽东否定张闻天提议

在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

上,中央考虑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,必须解决两军的统一指挥、统一行动问题,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,并决定组成一个慰问团到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。张国焘对任军委副主席一职并不满意,对秘书黄超道说:“中央见我队伍过于强大,不得不给我一个副主席,其实我一个副主席在开会时又形成不了多数。”当慰问团在杂谷脑期间,他煽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让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,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。而陈昌浩又致电中央,要求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,目的是将一、四方面军统一交张国焘指挥。

7月18日,中央在黑水县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,研究如何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。“张国焘是个实力派,他有野心,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,一、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。”毛泽东找张闻天商量。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,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,张没有资格,也没有理由代替;只当军委副主席,他又肯定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、王稼祥平起平坐。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,说:“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。”毛泽东断然拒绝,边摇头边分析:“他要抓的是军权,你给他做总书记,他说不定还不满意,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,可又麻烦了。”

周恩来让出总政委职务

经过权衡,毛泽东、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。当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正患重病,卧床不起。毛泽东、张闻天来到周恩来住所,同他商量。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,经过反复研究,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

见,向各兵团首长发了通知:“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: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,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、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。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,并任(由)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。”

7月28日,毛泽东等来到了毛儿盖。在这里,张国焘要求中央解决“政治路线”问题,要求“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,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”。为统一思想,8月4日至6日,中央决定在毛儿盖以南20公里处的沙窝召开会议。张国焘说道:“我主张南下川康,如果一方面军要北上,则四方面军单独南下。”博古气愤地嚷了起来:“南下川康,正如同老鹰钻进了山沟,想飞也飞不起来。”张国焘腾的一下站起来,指着博古鼻子道:“你这党的败家子,配谈什么军事!”毛泽东厉声斥责他:“你这样泼妇骂街似的恶语伤人,哪点还像个共产党人的作风!”

另立中央“开除”毛、张、周、博

毛泽东、张闻天等对张国焘进行的说服和争取,没能达到成效。张国焘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,最终坚持南下。

10月5日,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,另立“中央”,自任“临时中央主席”,宣布“开除”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博古、张闻天的党籍,并下令“通缉”。对叶剑英、杨尚昆“免职查办”。甚至在会场张贴一幅大啄木鸟口含毛、周、张、博的漫画。张国焘得意地说:“卓木碉,啄木鸟嘛!我们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,要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!”

(据《党史博览》)

邓小平怒惩“陈世美”



1952年春天,主持西南大区工作的邓小平,觉察到干部队伍中滋生的贪图享受、闹离婚另寻新欢、腐化堕落的现象,越来越严重。在地师级干部会上,他指出:当前,我们干部队伍中享乐腐化思想在蔓延,突出表现在男女关系上,到处闹“婚姻改组”。有个市委9个委员中有7个闹离婚,十二军直属干部闹得最凶。这些人不是没老婆,而是进了城,见了年轻美貌的城市姑娘心就花了,再也瞧不起结发妻子了……此风不刹住,后患无穷。

会议结束,邓小平接到一位外地妇女的上书,控告抛弃她母女犯重婚罪的贵州省绥阳县县长李民。

递交诉状的妇女叫丁华,是山东老解放区肥城县的乡干部。1948年初她与李民成婚,后来生下女儿。不久,丁华怀抱女儿送李民参加支前大队。1950年春节,丁华收到李民来信:到达贵州绥阳县,上级已宣布任命我为县长兼任法院院长,一旦社会安定就接你母女来过幸福生活。她万万想不到,这封信后李民就音讯全无了。这是因为,当上县长的李民变心了。1950年下半年,刮来一股闹婚姻改组风,他也在暗自着手实施“改组”行动。据说,李民自看中一名年轻貌美的女教师后,第一步将姑娘调到县府办公室当秘书,便于游说;当姑娘家庭不愿女儿做“二婚、填房”时,就利用自己法院院长的权力逼其家属就范。

李民深知妻子丁华生性刚烈,是不会饶恕他的。他伪造证明和公函,骗取山东肥城县法院开出他与丁华离婚的证明。没想到,丁华带着女儿赶到了绥阳。李民自知罪行败露,不仅拒不认妻女,还说丁华是神经病人,命令法院法警将丁华母女押出县城进行迫害。丁华摆脱监视,深夜牵着女儿逃出绥阳,直奔重庆,向邓小平上书鸣冤。

李民案件令邓小平十分愤怒,他抓住这一典型案件来教育西南党员和干部。1953年1月2日,李民被判刑5年。遵照邓小平的指示,《新华日报》发表了《从李民事件记取教训》的社论,还报道了贵州省、遵义地委和绥阳县有关领导机关和责任人的检讨。

(据《世纪风采》)

《共产党宣言》首译者缘何曾脱党?

邓明以的《陈望道》一文中所叙述的:

“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党的‘一大’之时,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,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。据李达回忆:‘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,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。陈独秀复信没有答应,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。’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。陈独秀曾到处散发书信,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。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,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,信以为真,竟然为此感到痛心疾首,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,把李汉俊、陈望道二人大骂了一通。陈望道见到施存统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三丈,认为‘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’。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,并向他公开道歉。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……”

陈望道从此与陈独秀分道扬镳,并提出了脱离组织的要求。正因为这样,他没有出席中共“一大”——但他对建立中国共产党,确实立下了不朽的功绩。

陈望道在1923年中共“三大”之后,退出了中国共产党。陈望道在脱党

之后,如他所言,一直坚信共产主义。

经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共特别党员

1952年11月,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,从1952年至1977年,陈望道是这一世界名校任期最长的校长。

陈望道毕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,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共。特别是1956年元旦,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会见了这位老同志,回溯往事,更使陈望道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共。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,中共上海市委马上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。毛泽东主席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。他说:“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,就什么时候回来。不必写自传,不必讨论。可以不公开身份。”

就这样,陈望道于1957年6月重新加入中共,成为中共特别党员。入党之后,他没有公开中共党员身份。直至1973年8月,他作为中共“十大”代表出席会议,他的名字出现于代表名单之中,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共党员。

(据《老人报》、人民网)